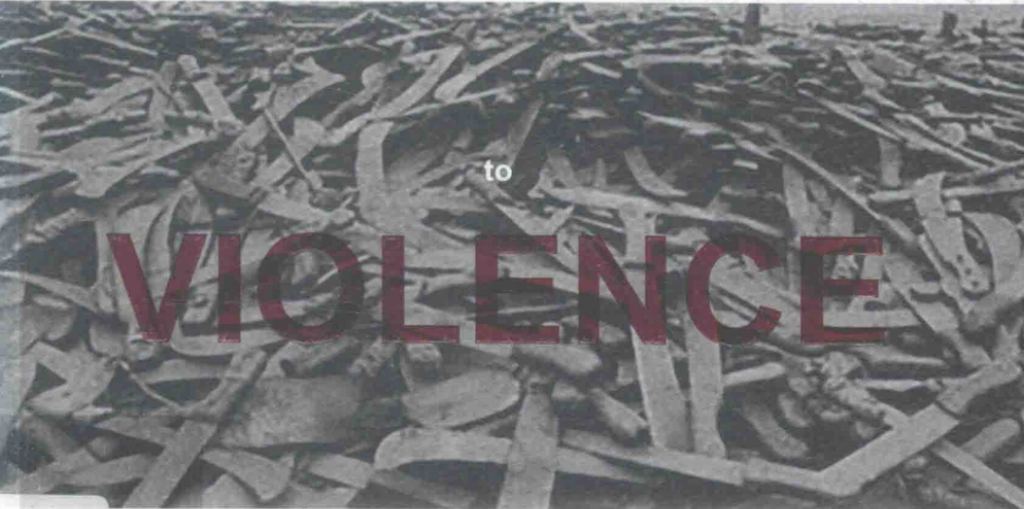


From
VOTING

从投票 Jack Snyder **到暴力**
[美] 杰克·斯奈德 - 著
吴强 - 译

| 民主化和民族主义冲突 |



to
VIOLENCE

Democratization
and
Nationalist Conflict

从投票 到暴力

Jack Snyder

[美] 杰克·斯奈德 - 著

吴强 - 译

民主化和民族主义冲突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VIOLENCE

FROM VOTING TO VIOLENCE

by Jack Snyder

Copyright © 2000 by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Shanghai Sanhui Culture and Press Ltd.

Published by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从投票到暴力：民主化和民族主义冲突 / (美) 杰克·斯奈德著；

吴强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1

书名原文：From Voting to Violence: Democratization and Nationalist Conflict

ISBN 978-7-5117-3094-7

I. ①从… II. ①杰… ②吴… III. ①民主—关系—民族主义—研究

IV. ① D082 ② D09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10029 号

从投票到暴力：民主化和民族主义冲突

出版人：葛海彦

出版统筹：贾宇琰

责任编辑：赵 灿 朱瑞雪

特约编辑：潘梦琦

责任印制：尹 珺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100044)

电 话：(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41 (编辑室)

(010) 52612316 (发行部) (010) 52612317 (网络销售)

(010) 52612346 (馆配部) (010) 55626985 (读者服务部)

传 真：(010) 66515838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80 毫米 × 1240 毫米 1/32

字 数：298 千字

印 张：14.25

版 次：2017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65.00 元

网 址：www.cctphome.com

邮 箱：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 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中央编译出版社 (ID: cctphome)

淘宝店铺：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 (<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010) 55626985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 55626985

致谢 //001

第一章 民主转型和民族主义冲突的兴起

- 当自由乐观主义遭遇 90 年代民族主义复苏 //006
- 什么是民族主义和民主化 // 011
- 民主化和民族冲突的关联：一些证据 //018
- 为什么民主化增加了民族冲突的风险 //022
- 在今天的世界做出选择 //030
- 本书计划 //033

第二章 民主化国家的民族主义精英说服

- 精英说服：增进大众的民族忠诚 //035
- 何时及为什么民族主义精英有说服力 //043
- 民族主义说服如何导致暴力冲突 //058
- 四种民族主义：起因和结果 //062
- 对民主化和民族冲突之间联系的其他解释 // 076
- 因果关系溯源和选择案例 //081

第三章 民主化如何点燃现代德国民族主义

- 德国的战争和民族主义，1864-1945 //087
- 关于德国战争和民族主义的其他解释 // 095
- 德国民主化打的民族主义牌 //098
- 在魏玛德国推销民族主义 // 110

第四章 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

公民的英国、革命的法国、族裔的塞尔维亚

- 英国的公民民族主义 //125
- 法国的革命民族主义 //152
- 塞尔维亚的族裔民族主义，1840-1914 //168
- 比较、相反和原因 //181

第五章 在共产主义废墟中的民族主义

- 后共产主义民族暴力的竞争性解释 //192
- 民族主义迷思制造和南斯拉夫解体 //205
- 大众政治和高加索战争 //224
- 后共产主义俄罗斯的媒体战 //240
- 后共产主义民族主义的比较 //257
- 公民民族主义对族裔民族主义以及后共产主义转型暴力 //267

第六章 发展中世界的民族主义和民主

- 发展中世界的民主化和民族主义轨迹 //276
- 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相反的双子 //281
- 印度：公民制度化和族群动员之间的赛跑 //295
- 卢旺达和布隆迪：多元主义和权力分享的危险 //304
- 减缓发展中世界民族冲突的条件 //316
- 结论 //320

第七章 民主化时代如何避免民族冲突

- 为民主转型编织一个深厚的安全网 //325
- 避免民族主义冲突的策略 //331

- 对民主化和民族主义动员的国际影响 //352

- 种族民主：一种对民主和平的威胁 //363

附录 //366

索引 //373

人名索引 //426

致 谢

下面我要感谢的许多人都把我的民主化和民族主义观点概括为相当“挑衅性的”。我怀疑那意味着他们要和对本书饶具贡献的任何可能暗示保持距离。但我还是要感谢他们。

有关民族主义的论点，是我在对民主化和国际战争风险升高两者联系的平行研究中发展而出的。爱德华·曼斯菲尔德（Edward Mansfield）是我有关此主题一系列文章的合作者，他让这项研究成为充满乐趣的学习经验。曼斯菲尔德精心设计的统计检验也有助于我看到，欧洲民主强权的倡导行为也是一个更普遍模式的一部分，对民族主义研究具广泛意义。

卡伦·巴伦坦（Karen Ballentine）是我另一篇文章《民族主义和观念市场》（《国际安全》，1996 年秋）的合作者，这篇文章已经展示了本书所采用的许多基本论点。那些论点，从我们相互间无数次的平等对话和修正中发展而来，在本书几乎每一个章节都留下了印记。巴

伦坦也是一位犀利的批评者，她对本书缺陷的质疑如同她对本书的贡献，分量皆重。我也从她其他有关族群联邦主义的著作中获益良多。

哈伊姆·考夫曼（Chaim Kaufmann），在我努力完成前两章的初稿后，以他的扼要评论对本书的全盘研究施加了巨大影响：“我还不觉得好玩。”因为考夫曼读过的那些章节，读者现在不必再读了。所以现在很快就会好玩了，但愿如此。

在那些为各章节进展的不同阶段提供了极为有用的评论的人中，有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罗杰斯·布鲁贝克（Rogers Brubaker）、瓦勒力·布恩斯（Valerie Bunce）、詹姆斯·费隆（James Fearon）、萨米特·甘古力（Sumit Ganguly）、约翰·霍尔（John Hall）、斯图尔特·考夫曼（Stuart Kaufmann）、简·库比克（Jan Kubik）、卡伦·匹柏迪·欧伯良（Karen Peabody O’ Brien）、巴里·波森（Barry Posen）、斯蒂芬·赛德曼（Stephen Saideman）、谢里尔·斯托玄（Sherrill Stroschein）、阿舒托什·瓦什尼（Ashutosh Varshney）和另外三位匿名审稿人。菲奥娜·亚当森（Fiona Adamson）、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罗纳德·罗格斯基（Ronald Rogowski）和莱斯利·维亚姆日（Leslie Vinjamuri）对“观念市场”一节提出了颇具建设性的意见。罗宾·巴蒂（Robin Bhatti）、奇普·伽农（Chip Gagnon）和安妮·内尔森（Anne Nelson）都特别慷慨地与我分享了信息、参考文献、文件和思想，允许我近乎无耻地掠夺他们的专长。哈伊姆·考夫曼、罗伊·里克利德（Roy Licklider）、芭芭拉·沃尔特（Barbara Walter）和泰德·古尔（Ted Gurr）的风险少数族群（Minorities at Risk）项目的安妮·皮奇（Anne Pitsch）帮助我设计了族群冲突的清单。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慷慨地许可我引用他尚未出版的著作，对后共产主义国家

的民族主义进行分类。

与哥伦比亚大学从事民族主义和相关课题研究的、富有创造力的各位学者们进行的对话，更让我受惠无尽。特别是与同事卡伦·巴克（Karen Barkey）和亚历山大·莫蒂（Alexander Motyl）一起参与的东欧民族主义系列工作坊，与安东尼·马克斯（Anthony Marx）共同教授的战争与种族课程，使我从中习得良多。一个同样激发了许多影响这本书的灵感的源泉，是麻省理工资助的第21讨论课（Seminar XXI）上，与斯蒂芬·范·埃维纳（Stephen Van Evera）进行的每年一度的争论。

特丽莎·劳森（Teresa Lawson），如她常做的，设计了无缝的逻辑路径，重新组织了一些极不像样的章节，并且把我从无数次逻辑失误中拯救出来。克莱尔·埃勒斯（Claire Ehlers）在对我的论点本质保持着敏锐评论的同时，提醒我那些大二学生还未学过的所有历史事实和术语。在诺顿出版社，莎拉·卡德维尔（Sarah Caldwell）展现出一连串令人咂舌的技巧，在编辑阶段如劳森一般高超，在最后选择美术、地图和表格时，则富有韧性，品味上佳。凯茜·塔拉勒（Kathy Talaley），我的文字编辑，不仅对每一处格式错误都很警觉，而且也善于及时更新与巴尔干最新发展有关的文字。诺顿的罗比·哈林顿（Roby Harrington）则肩负责任，努力让我相信接下写作这本近乎不可能的书是可能的。我还从未遇到过比他更直率的、有说服力的家伙。

11

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我从几个紧密相关的项目中得到研究资助：哈里·弗兰克的古根海姆基金会及美国和平研究所对民主化与战争研究的支持，皮尤基金会赞助的民族主义历程工作坊，福特基金会对内战书籍的资助，以及卡内基公司评估非政府组织对促进民主化和防止

族群冲突的一个项目。

这一研究进行中颇为娱乐的一面是从我的那些富有创造性的朋友处征求可能书名的意见。卡特琳·罗玛诺（Catherine Romano）带来“生机民主：不得不爱，战争和一切”。兰达尔·斯维勒（Randall Schweller）的建议最简洁：“跑！这就是民主。”但是我的妻子尼娜（Nina）提出的书名最终胜出，也是这本书最后的书名。这本书正是献给她的。

杰克·斯耐德

纽约城

1999年6月

第一章

民主转型和民族主义冲突的兴起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外交政策的中心点是主张促进民主的传播就会促进和平。基于从未有两个民主国家间相互发生战争，比尔·克林顿总统所宣称的对民主化的支持就不啻国际战争和国家内乱的解毒剂。¹ 只是，吊诡得很，整个 90 年代，最终却是民主化和民族主义冲突持续并存的十年。

15

当所有国家都转变为成熟的民主，世界也就太平了，克林顿的传统智慧在到处可见的危险面前失灵了。火箭般的民主转型常常引致好战的民族主义和暴力的族群冲突。从法国大革命开始，最早的民主化进程，就曾触发世界上最为惨烈的民族主义斗争。

在世界范围的民主传播当然是一个可贵的长期目标。但是，此战略

16

1 见其在 1994 年国情咨文的演说。"Transcript of Clinton's Address,"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6, 1994. A17. 对民主国家间少有战争的问题，see Michael Doyle, "Liberalism and World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0: 4 (December 1986), 1151-1169.

的完成必须由对转型政治的现实主义理解来引导。天真地向族群分裂的威权国家施压，要求立刻举行大选，只会造成灾难性后果。例如，1993年，国际财政援助者强压中非小国布隆迪的领导者举行自由、公正的选举，结果一年内，5万胡图人和图西人在种族冲突中丧生。当然还有许多其他国家成功民主转型后并没有引发民族主义冲突。思考这些成功转型的前提条件应该是设计朝向民主道路的第一步。为此目的，本书意在解释为什么民主化常常会导致民族主义冲突，以及为什么冲突有时候并没有发生。在此分析基础上，我将描述一些让民主转型不太危险的方法。

当自由乐观主义遭遇 90 年代民族主义复苏

当 1989 年柏林墙倒塌，一幅欣快图景很快出现在美国人民的想象中。自由主义已经在 20 世纪的两种意识形态竞争中战胜了共产主义和法西斯民族主义，目之所及再没有新挑战者了。帝国和独裁者垮台了。民主化席卷拉美、南欧和东欧的前威权国家，连东亚也上道了。几乎所有国家都接受了市场经济。全球的经济相互依赖，继续深化。自由的美式大众媒体和通俗文化也触及全球各个角落。这个被宣称为自由主义的胜利，将迎来“历史的终结”。¹

自由主义的评论家们，他们相信所有的好事都会一起到来，认为战争已经变得过时，至少，自由国家正在建立一个主导性的全球趋势。²1990

1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16 (Summer 1989), 3-18.

2 John Mueller, *Retreat from Doomsday: The Obsolescence of Major Wa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9).

年出版的一本恢弘大作，总结说，民族主义这种通常被定义为每个文化集团都应拥有自己国家的学说，正在被迅速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因为由单一民族组织起来的国家再难应对相互依赖的全球化世界。¹

胜券在握的自由主义大路上剩余的几个绊脚石，可以借助一整套生机勃勃的国际制度来克服——有联合国部队维和，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家们诱引各国就自由主义之范，然后强加财政纪律。为力保如此愿景，克林顿总统解释说，促进民主化将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暗号，因为民主国家间从未相互开战，他们贸易自由，尊重各自国家公民的人权。²

克林顿的愿景很快就被玷污了。柏林墙倒塌后战火延烧。不止大小战争在国际秩序边缘爆发，世界的原油供应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面临极大风险；1991年6月，南斯拉夫军队对斯洛文尼亚分离主义者的战斗离维也纳不过100英里；北约空军在1999年科索沃冲突中进行的持续轰炸遍及塞尔维亚全境。民族主义的修辞，不顾曾经的臭名昭著，又流行起来。而在1993年俄罗斯蹒跚学步的大选中，大约四分之一的选民把选票投给了反犹主义的新法西斯党候选人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Vladimir Zhirinovsky，希特勒在1932年不过赢得三分之一的选票）。从索马里到波斯尼亚的内战，自由国际社会的武装力量被骚扰、攻击，被地方武装分子劫持。1994年的卢旺达爆发针对图西族少数民族的大屠杀，第一天就有比利时维和部队士兵阵亡，在其后的种族骚乱中有超过50万人死亡。

其结果是，传统智慧很快到头了：《大西洋月刊》重新为后共产主

1 E. J. Hobsbawm,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Chapter 6.

2 除了1994年的国情咨文，还可以参见：克林顿的国家安全顾问 Anthony Lake, "The Reach of Democracy,"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3, 1994, A35.

义世界贴上“即将到来的无政府”标签，著名哈佛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则宣称未来将充满“文明的冲突”。¹在这些权威人士看来，文明冲突，无论沿着整个文明的断层线还是简单地介于不同族群之间，都可构成当下国际关系中明确的分裂。新闻媒体和政治领袖们通常将这些严峻发展归为敌意文化间的“古老仇恨”，暗伏了数个世纪，一旦冷战的锅盖被揭开就开始沸腾。这种解释太简单、直观，并且被种族屠杀的始作俑者的说辞日日强化。对那些为尽力避免卷入不体面冲突而寻找借口的西方政治家来说，古老仇恨的故事对于粉饰那些无望解决的棘手争论颇有好处。但即使那些保有愿景将自由民主传播到全球角落的人也认为，古老的种族偏见或为自由主义的最大敌人。克林顿总统在1993年的就职演讲中提到：“在冷战阴影中成长的一代，肩负被自由阳光所温暖同时又被古老仇恨所威胁的世界的新责任。”²

18

好消息是，这种观点基本不正确。最近全球大部分纷争都不是因为古老的文化仇恨。在一些案例中，直到晚近，交战团体间并未发生过武装冲突。比如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直到20世纪前从未兵戎相见，大体上只是因为德国纳粹在萨格勒布扶植了一个杀人凶手组成的、不具代表性的政权。³另外一些案例中，所谓文化或族群群体间的偶然冲突，

1 Robert D. Kaplan, "The Coming Anarchy," *The Atlantic Monthly* 273: 2 (February 1994), 44-76; Samuel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72:3 (Summer 1993), 22-49.

2 Quoted in Susanne Hoeber Rudolph and Lloyd I. Rudolph, "Modern Hate," *The New Republic* 208:12 (March 22, 1993), 24. 克林顿后来提到他的“古老仇恨”的评论是个错误。see Katharine Seelye, "Clinton Blames Milosevic, Not Fate, for Bloodshed," *New York Times*, May 14, 1999, A12.

3 塞尔维亚第一次陷入与克罗地亚的武装冲突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其中入侵塞尔维亚的奥匈帝国军队半数都是克罗地亚人。然而，这次入侵军队的四分之一是从克罗地亚区边界那边来的塞族人。由于塞族人同时两边作战，“一战”很难算是一个古老族群冲突的例子。Dimitrije Djordjevic, "The Yugoslav Phenomenon," in Joseph Held,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Eastern Europ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2), 310.

不过是穿插在他们和睦关系中的长期插曲罢了，所谓文化差异根本不能作为近来战事的一个充足理由。几乎没有学者将民族主义和族群冲突归因于古老的文化仇恨。¹

坏消息，无论如何，相当反讽：自由派看来的历史终结之趋势已经在许多地方助长了民族主义的复兴。威权的苏联帝国的终结刺激了它的许多混合民族中有野心的领导人，建立起他们自己的国家，而且他们有关主权和领土的冲突性诉求常常引发争议。²选举常常加剧这些族群和民族的差异。在一些新兴民主国家，民族主义煽动者利用增加的出版自由绑架自由主义的公共讨论。³朝向市场经济和国际依赖的痛苦调整也给民族主义政客们提供了更多机会，他们会许诺只有更强的国家才能提高保护，或者按照族群界限来分配萎缩的经济收益。同时，全球化的媒体和文化，常常压迫而不是吸引那些试图依靠融入西方世界取得繁荣却失败的国家。⁴更有甚者，就像一些批评家说的，国际组织有时也引发更多冲突，而不是避免无能的维和战略或者经济改革的严格哲学。⁵

自由乐观主义者大概会觉得惊奇，这些 20 世纪 90 年代的发展的确回应了民族主义历史中的一些长期模式，我会在后面章节中展开。民族

1 虽然族群冲突是战后景观的一个压倒性特征，但它们在所有冲突中的比例并没有增加。Myron Weiner, "Bad Neighbors, Bad Neighborhoods: An Inquiry into the Causes of Refugee Flow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1:1 (Summer 1996), 21-22, 指出 1969—1992 年非族群难民引发的冲突比例增加。

2 Karen Barkey and Mark Von Hagen, eds., *After Empire: Multiethnic Societies and Nation-Building* (Boulder, CO: Westview, 1997) 将苏联崩溃置于比较视野内。

3 Jack Snyder and Karen Ballentine, "Nationalism and the Marketplace of Idea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1:2 (Fall 1996), 5-40.

4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25-62; Mark Juergensmeyer, *The New Cold War? Religious Nationalism Confronts the Secular Stat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5 Richard K. Betts, "The Delusion of Impartial Intervention," *Foreign Affairs* 73:6 (November/December 1994), 20-33; Susan Woodward, *Balkan Traged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1995), Chapter 3.

主义，并非某种过时的返祖现象，而大致可谓对现时代社会变化的一种反应。西欧在法国大革命和“二战”之间，一个见证了现代民族主义和人民战争兴起的时代，经历了这些变化。其间，民主化、经济发展和传播方式的革命都在助燃民族主义，而且常常以好战的形式出现。被社会变化拖向民主转型的国家，更倾向于参加战争，或者比那些没有发生变化的国家更倾向发动战争。¹ 冷战的结束在后共产主义国家释放了向民主和市场社会转型的危险，增进了民族主义的流行。

20

尽管民主化提高了一个国家的战争风险，却有历史证据表明在开始民主化之后的头十年，每四个民主转型国家中就有三个最后避免了战争。而且，一旦自由民主巩固下来，再没有成熟的民主政权会相互开战了。在 90 年代那些民主转型已经充分巩固的国家中，少数族群的权利趋向改善，族群冲突也相当罕见。²

结果，这本书的主旨就构成一个悖论。一方面，成功展开一场全球的、自由民主的革命会夯实一个和平时代的全球政治基础。另一方面，民主政治的转型同时也在培育民族和族群冲突的肥沃土壤，不仅可能增大转型成本，而且导引人民走向一条漫长的反民主的曲折道路。比如三个通过发动侵略差一点就成功扭转全球平衡力量的先例：1803—1815 年的拿破仑法国，1914—1918 年的威廉皇帝德国，以及 1939—1945 年的希特勒德国，都是

1 Edward D. Mansfield and Jack Snyder,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Danger of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1 (Summer 1995), 5-38; Mansfield and Snyder, "Democratization and War," *Foreign Affairs* 74:3 (May/June 1995), 79-97.

2 Ted Robert Gurr, *Peoples versus States: Ethnopolitical Conflict and Accommodation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Washington, DC: US Institute of Peace, 2000); see also Ted Robert Gurr and Will H. Moore, "Ethnopolitical Rebellion: A Cross-Sectional Analysis of the 1980s with Risk Assessments for the 1990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1:4 (October 1997), 1079-1103.

在民主努力失败之后接踵而至。民粹的民族主义能量，通过民主改革的流产而释放、倒错，创造出牌条件，图谋全球霸权。民主化过程可能是民族主义最坏的敌人之一，有关和平的承诺笼罩着战争的阴云。

企图不冒这些风险而促进民主化，更像自我安慰的理想主义。然而
27
试图遏止可能刺激民族主义的全球社会进程，包括日益增长的大众政治参与的需求、陈腐帝国的崩溃、经济和传播的全球化等，也同样不够现实。相反，国际社会的一个关键任务就是区分两种情况：是否有助于向自由民主安全转型，还是会引发反弹、民族主义或者战争。到目前为止，精明的政策选择能够帮助创造出更适宜的条件，理解民主化的陷阱是避开它们的第一步。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每一位从事民主化工作的人的分析任务，这些人包括：先进民主国家和转型国家的政治家们、新闻记者、人权活动者、学者、公民，甚至民族主义者，只要他们在追求他们的民族目标时试图避免付出高昂成本。

在导论章节中，我要首先定义我所说的民族主义和民主化；第二，概述那些与早期民主化相关的民族主义冲突；第三，挑战所谓古老的民族间对抗可能解释这种相关性的观点；第四，简述我的另类解释，其中特别强调民族主义精英对大众的说服角色；第五，讨论这种理论的政策选择含义；最后，提供一个路线图，有关历史和当代的案例研究，也就是这本书的主体。

什么是民族主义和民主化

民族主义

在日常用法里，民族主义的表现可以指代一系列差异巨大的现象，